



台湾地区文学透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世界华文文学中心编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新世纪文丛

台湾地区文学透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世界华文文学中心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25 印张 4 插页 159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2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 7-5419-1946-2/I·77

定价：15.4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市太白路 1 号 邮编：710069 电话：8302841

目 录

- 001／ 第一章 飞鸟犹知恋故林
——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
- 025／ 第二章 台湾地区文体风貌
- 070／ 第三章 在世界主义的陡坡上
——台湾现代小说的表现艺术
- 087／ 第四章 凡人时代的救赎之路



		——台湾新文化小说
120 /	第五章	文明的红灯示警
		——台湾“环保文学” 的发生与发展
135 /	第六章	星约·情冢·诗课
		——张晓风散文论
167 /	第七章	鹿港·性·社会工作者
		——李昂的小说世界
189 /	第八章	不敢为梦终成梦
		——席慕蓉的艺术魅力
206 /	第九章	撩开心灵的帷幕
		——欧阳子的小说创作
222 /	第十章	根脉相连血相通
		——海峡两岸的“寻根 文学”比较
247 /	后记	



第一章

飞鸟犹知恋故林

——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

在对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对其所呈现的“中国情结”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但同时，一般人着意的，往往停留在“血浓于水”之类的情感与文词上，而忽略对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及其在台湾的本土新质的探讨。这种“原型”与“新质”的关联，在文学层面上，若以知识命题论之，即是文学母题及其变奏，很值得我们作一番思索。

1825年1月18日，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话时指出：“母



题多么重要,这一点是人们所不理解的,是德国妇女们所梦想不到的。她们说‘这首诗很美’时,指的只是情感、文词和诗的格律。没有人梦想到一篇诗的真正的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成千上万的诗篇就是根据这种看法制造出来的,其中毫无母题,只靠情感和铿锵的诗句反映出一种存在。”^①歌德从诗的角度谈“母题”,又把它和“情境”列作同义,未必是准确而完整的理论表述;但他强调“母题”的重要性,对追求文学作品更富有深刻的历史精神内涵,对我们在文化原型所提供的广袤南亩里穷达从容、纵横拾穗,无疑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提示。

考察文学现象,常常会发现许多作品潜在的母题及其不同的呈示方式。因而有的批评家认为:“蕴藏最深的思想——超过了某种作品乃至许多作品的思想,必须在原型象征物中去寻觅,作家也不得不转向这些象征。”^②这不是意味着作家以初民身份从事传统资料的演义,而是从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原型象征物中获得体验的凝聚和题旨的提炼,使一些基本母题得以赓续和新的诠释。“母题”原系音乐术语,迨至文学,狭义的是指原始主题,广义的,则可谓传统文化母体中基因似的经常重现的主题、形象、故事和情境的复合体。“母题”往往是超个人的,它反映着一民族世世代代普

①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② 勒斯利·费德莱尔:《当代文艺研究成果》,转引自〔美〕魏伯·司各特编著《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138页。

遍性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存积,是历史和文化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自然,它的情思内涵将由于优秀作家个性感受的加入而呈现增殖。“母题”往往生存于既定的、文化层的语境中,其题义联想,体现着传统的力量,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熟悉,遂使作品不是囿于“自我情结”,而是让母体文化的声音在人们心中共鸣。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史实。中国人在自己的台湾地区承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是顺乎自然、天经地义的。“愁云极目昼成阴,飞鸟犹知恋故林”^①,是近代台湾杰出的爱国将领兼诗人丘逢甲怆怀家国的血泪诗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②,是现代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的“原乡情结”和人生格言。当代作家如出生于台湾的学者兼诗人杜国清也说:“作为一个台湾诗人,只要在创作上使用的是中文,他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挑战。而他的创作成就,终将归入这个传统,不管是被统入,或注入新的品质,而使传统原有的次序重新调整。”^③中国文学作为台湾地区文学的“母体”,有其传统与精义,有其魂魄与血脉,有其与民族共存荣的历史,作为生长在台湾省的中国当代作家,谁想“跳出”或“割除”共同的文化——文学长河,都是徒劳的。

浸淫于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大河,根据台湾地区

① 丘逢甲(1864—1912):《愁云》,参见《岭运海日楼诗抄》。

② 钟理和(1915—1960):《原乡人》,《钟理和全集》,第2卷。

③ 杜国清:《笠·台湾·中国·世界》,台北《笠》诗刊,第151期。



特殊的人文情境而进行创作，成了不少台湾当代作家的文心和追寻。函绵邈于尺素，中国文学的一些原型在这里敷演铺叙，群体性的“种族记忆”在这里腾挪流转，衍化为种种“母题”。若作大体的归纳，台湾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中国文学母题，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悲情母题：“诗可以怨”的历史延伸

梁启超当年写台湾，砚沾悲情，称这里是“千古伤心地”^①。侯效贤执导的在国际上获大奖的台湾影片，取名《悲情城市》，也以沧桑变迁反映台湾地区人民共通的哀怨。悲情之雾弥漫于文山韵林，到了当代作家笔端，亦自迥出尘埃，有悲情母题的提炼。小说家陈映真的早期名篇之一《乡村的教师》，着实是借小说艺术隐秘地表述一种苦难、悲情以及对理想的向往与破灭，让人物分担民族的忧郁。小说中，个人的苦难以社会的、历史的和时代的苦难为呈现方式。佃农出身的主人公吴锦翔，青春年少时富于改造、建设家乡的热情和理想。不久被日军强征去异域当兵，经受了一场“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的洗礼，并为了存活而在婆罗洲参加过“人肉”筵席。烽火五载如梦一般过去，吴锦翔重返故里，接办一所乡间学校，年青时改革乡土的热望重新

① 见梁启超《台湾杂诗》之一：“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愁。人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无家更安住？随意弄扁舟。”

燃烧起来。然而光复后，依然是岛内磨难，国内动荡，民族分离，无情的现实剥夺了他实践理想的可能，心中的蓝图不过是画饼充饥式的“精神享受”而已。尤使他陷于绝境的，当他在酒醉时透露了曾“吃人”的秘事，村人都远远离开了他，终于良心幻灭、理想崩溃而切脉自尽，那“无血液的白蜡一般的脸上，都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深深怀疑的颜色”。对于这篇作品，有论者视为写了社会现实迫使改革论者言行背反，或是因跋涉现代派而望不见旭日东升。^①这种从“主义”出发的论评权当一家之言。我倒愿意请读者注意潜藏于作品的“人肉筵席”的意象。吴锦翔死里逃生，但在战争中吃过人的罪恶感，需要他以相当的勇气去承受内心良知与现实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痛苦的折磨，而环境又是“吃人”的社会，他的归宿必然是既吃过人又被人吃的悲剧结局。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意味深长的悲情母题。《乡村的教师》很自然使人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的母题：没有年代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仁义道德”，字缝里则是“吃人”二字。鲁迅极尖利地解剖了精神分裂的心态：“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②这“眼光”和《乡村的教师》中死者最后的“脸色”，都在“深疑”上吻合，看来绝非偶然。悲情在于切切实实的人生竟成为的确确

① 参见辽宁版《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

②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集》，21页，1952，北京。

的灾难。既“吃人”又“被人吃”，便是这种悲情的物化形态。这类母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断重现。即以《红楼梦》（这委实是一部多种母题杂陈的繁富的大书）中的王熙凤为例，判她是“反面人物”有失公道，此人要说也是悲剧。她是封建家族管理的代表，两面三刀，贪婪心狠，杀伐决断，俨然是“吃人”的角色；但她对上，又是个佞臣，丑角，被贾母寻开心的“猴子”，到头来只剩下跪诉流泪的份儿，还是“被人吃”了，终于也汇入“渺渺茫茫、归彼大荒”的人生悲剧的大命题中。白居易《轻肥》诗云：“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不仅是具体的真实，也是普遍性的真实；不仅是天灾所致，也是由人祸酿成——在人吃人的社会和年代，民生惟有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无限怨恨。白居易因深疑而怒火中烧：“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①悲情转化为悲愤。再往上追溯，屈原明知会招来“鮌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离骚》）的惨局，却仍然坚执于“知死不可让”（《怀沙》）的品行，“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是十分突出的悲情性格。文学史上，变《风》变《雅》之哀怨，建安七子之悲凉，鲍照、庾信《拟行路难》《哀江南》的愠怆，杜甫“三吏”“三别”之沉郁，陆游、辛弃疾对收复河山之悲怀，乃至黄遵宪《台湾行》之诗怨，莫不以“悲情”二字投入人生和文学。由此看出，悲情主题和悲情形象，就如同基因般地可以在中华民族文学的总母体中找到踪迹。

① 白居易：《杜陵叟》。

悲情母题在台湾当代文学^①中不断繁衍，其发展路向大致分为两种形态。

其一是炼狱式悲情。台湾地区曾两度沦为荷兰殖民者(1624—1662)和日本帝国主义(1895—1945)直接控制的殖民地，在台湾人民灵台上留下耻辱与苦难的深深印痕；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祖国，但随着国民党当局迁台，实行“反共”、内控的高压政策，使岛内民众加深了再度与大陆分离的精神苦难。这双重的悲怆境遇，既造成了特殊的社会情态与普遍心态，也使那些具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当代作家，在其笔端凝聚更为强烈的忧国之痛和感时之哀。这种悲情是富有历史性的，作家投入人生的悲情，也就势必会让笔下的主题和形象带上“炼狱”的特质。被称作“大河小说”的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即以反殖民、反封建、反迫害为题旨，以粗犷的写实笔法展开人物的苦难命运，艺术地概括用血泪与炼狱写成的孤愤和抗争的历史。《台湾人三部曲》由《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组成，以自甲午战争(1894)到抗战胜利(1945)半个世纪为历史背景，以陆氏家族从流寓台岛筚路蓝缕到前赴后继抗日救国为主线，让几代人经受坎坷人生的折磨和良知灵魂的拷打。诚如作家所述：“他们是一群冒险犯难的贫者——在大海尚被赋予不可知的神性的时日里，他们越过汹涌的波涛

① 需要补充一个概念上的说明：按照约定俗成，“当代文学”在大陆均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台湾地区当代文学”，依我治学所见，宜从抗战胜利回归祖国算起，因它标志着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终结和新的文学阶段的开始，有其当代性。



而来，定居在这蕞尔小岛上。……为了生存，他们开疆辟地；与大自然争斗，亦与大自然共存。为了生存，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周旋，从不低头屈膝。”^①《寒夜三部曲》和前者一样可称作“一部本省的史诗”。小说由《寒夜》、《荒村》、《孤灯》三部组成，写的是彭阿强一家三代人不同的人生经历，第一代罹辱受欺于险象环生的自然和官府恶人的敲榨的双重炼狱，第二代经历日本殖民者铁蹄下抗争——失败——再抗争的种种磨难，第三代又被强征入伍投放异域承受更残酷而凄苦的人生，却依然如同一盏不灭的海外孤灯向着“母亲”和“蕃仔林”。一个苦难时代接着又一个苦难时代，寒夜漫漫，自有勤劳坚韧的传统美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在作品主人公身上流贯：“我们要打拼，肯打拼，总会有出路！”可见，并非一切哀怨、悲怆皆可成就艺术悲剧，惟有让悲情母题经受一番“炼狱”，使之与高洁之意志和时代之要求紧紧相联，才能爆发震撼人心的思想与艺术的力量。

其二是狂狷式悲情。台湾当代作家以悲情投入人生与文学，既有从时代和社会历史的视点去实写民众苦难的艺术取向，又有一类作家，则从日常生活切入，把民众个别、特殊的生活细节较隐蔽地集约于悲情观念里，且喜欢以不轨于道的狂狷笔法，传达内心的悲与怨、恨与怒。这一特点，往往在新一代作家身上多有体现。所谓“狂狷”，按照中国反封建思想先驱李贽的说法是：“圣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化之圣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微称也；有恒者，狷

① 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楔子》。

者之别名也，是皆信心人也。”^①今之台湾中青年作家自然不能以“圣人”“君子”作比，他们的忧愤也不如历尽苦难的前辈作家那样深广，但与历史性的反思结伴而来的，是他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亦有怨有恨，为赋悲情而取狂狷的策略。如青年小说家张大春的代表作之一《四喜忧国》（1987），写一位以掏大粪维持生计的退伍老兵朱四喜，疯疯傻傻地突发奇想，模仿官场政要，撰写并散发了一份内容荒唐的《告全国同胞书》。构成小说浓烈的悲喜剧色彩的，是四喜及其周围在底层的芸芸众生，愚昧无知，又受军方意识的灌注，心灵被扭曲而极度的僵直。他们在“世界越来越糟”的环境中作痛苦而无为的挣扎。作家蓄意把“尊贵”的和粗鄙的杂糅在一起，平添了欲哭无泪的悲感，却也是狂狷式的嘲弄反讽，开着上层社会的玩笑。另一位著名的新生代小说家黄凡，著有《赖索》《大时代》《零》《自由斗士》《伤心城》《天国之门》《反对者》《慈悲的滋味》《上帝们》《都市生活》《东区连环泡》《你只能活两次》等多部作品。作为“都市文学”的身体力行者，他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推入政治漩涡和都会网络，演出一系列的闹剧，一连串的悲欢，活画了台湾地区变态畸形、纷乱杂沓的怪世相，拷打各色人等的灵魂，并在语言策略上多有“平面拼贴”、“分解和重组”等运作，诙谐、嘲讽、冷漠，快速转换，让人在哭笑不得中感悟人生的悲情。这些狂狷式的悲情并非“新潮”，骨子里依然是“诗可以怨”的历史延伸。所不同的是，已从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附属被动，

① 参见《藏书》卷32《儒臣传》。

向现代文学“改造国民性”的能动意识转化，从而使悲情母题的变奏和新质，得到历史与现实的求证。

羁旅母题：寻找家园的游子之魂

羁旅母题源自传统。从屈原、曹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开始，“羁旅”、“游子”以及与之相随的“长风”、“飘蓬”、“鸿雁”等等，乃是中国古典诗文中频频出现的主题和形象。从“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张泌），“乱山残雪夜，孤独异乡人”（崔涂），再追溯至《诗经》中的《小雅·鸿雁》、《卫风·河广》、《曹风·浮蜚》，莫不浸透远离乐土的漂泊感，抒发着在未确定的空间里苦苦寻找归属的渴求或绝望。中国历代文人笔下的羁旅母题，“游子”的身份对于政治往往如影随形。李白一度畅想梦游云天和对月放歌，仍然逃不脱被迁逐的厄运——“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鲸鲵未剪灭，豺狼屡反复。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遭遇二明主，前后两迁逐。”^①这种迁逐感不仅反映了孤寂的情境，也表现了浪子忧国忧民的内心伤痕。

在人类文化史上，这种羁旅、迁逐、游子的现象，往往是肉体、精神、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塔柏里(Tabori)对此下过一个著名的判断：“一个人被迫离开家国，虽然驱迫他上路的力量可能来自政治、经济，甚至纯然是心理作用。但是否是肉体上感受的压力，或是没有即临的压力而自己做

① 参见李白诗《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书怀示易秀才》。

决定,两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①按照这种说法,不论是实质的或心理的,所谓放逐即“被迫离开家国”。这一定义尽管曾被某些论者照搬套用,但就台湾当代文学而言,则无法“对号入座”。道理很简单:流离台岛的“弃儿”“孤儿”,堪称“内部的放逐者”,他们并非离开了自己的家国;即如远走他乡异国,亦非一概直接来自外力的趋迫,多数人是一种精神上的羁旅,他们只要一张机票或船票就可以结束“放逐”处境。

从台湾地区的实情来看,历史与现实的羁旅现象特异而且复杂:(一)有些是历史上被迫流离。如叶石涛所说:“先民在唐山遇到饥馑抑或‘苛政猛于虎’的情况下活不下去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原乡……来到台湾之后,他们都抹不去被‘放逐’的暗澹的情绪。”^②(二)有些是出于现实政治原因,在海峡两岸对峙的情境下流落台湾,造成了“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的流浪心态。(三)近四十年来离开台湾地区,留学或移居他国的现象较为普遍,他们既思大陆又念台湾,空间的双重转移变成望乡的双向投射。(四)除极少数“台独”分子之外,本岛台湾人自认海峡两岸血脉相连,其母体是大陆,即使居留台湾也形同放逐。而岛上狭小的生存空间,加深了心灵空间对辽阔江山的缅怀,“亚洲女飞人”、台湾著名田径宿将纪政最近倡导和组织,旨在“跑遍大好河山”、

① 塔柏里(Tabori):《放逐的解剖》,37页,1972。

② 叶石涛:《台湾文学里的“放逐”主题》,《台湾文学的悲情》,149页,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

“追寻更广阔的空间”的“台北—上海—北京接力长跑”，即是一个明证。上述特异且复杂的羁旅现象显映于台湾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因种种放逐的处境而有不同的悲吟，但共通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从母语中放逐，也不囿于个人情绪的宣泄，而多属一种“集体意识”的共鸣。余光中的诗传送着这一意识在羁旅母题中的回响：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①

如果是一再重复同一主题，可能会掏空羁旅母题的内涵。实际上，台湾当代文学中因情境的差别、风格的变异和个体样貌的展示，促成了同一母题的实体变得丰厚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作家进入羁旅的书写世界，其形态与性征显得特异而且杂多。

对应于流离的，是“孤儿”形象的艺术创造。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最初揭橥羁旅意识且描写较为充分的，当推老作

^① 余光中：《当我死时》，《敲打乐》，55～56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86。

家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小说集中刻画了被放逐的台湾知识者胡太明，不甘承受日本殖民者的歧视与凌辱，为了寻求光明和自由，奔赴大陆，当局又怀疑他是“日本间谍”抓捕入狱，最后越狱逃脱回到台湾，装疯卖傻，以与黑暗的现实抗争。胡太明的人生悲剧，他大半生的优柔寡断、摇摇摆摆、逃避观望，正是“孤儿意识”的悲切投影。青年作家吴锦发在他著名的小说《叛国》里，描写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受辱受屈的苦难历程，主人公寻求“福居”之后过着自我放逐的羁旅岁月，即使回到台湾，依然抹不去阴惨的流浪与疏离的感觉。作家在作品中传达了一种在“正统教育”之外寻求历史真相的意向，以宽容、人道的态度，理解历史云雾中人物的特殊处境，开掘常常被尘垢所掩埋的萌发“孤儿意识”的真实原因，即历史的特殊际遇变成了双重放逐者。

对应于流落的，“乡愁”成为记忆的重要方式。应该指出，在早期的一些当代作品中，“乡愁”有配合政治、充当宣传的不光彩之页，正如白先勇所说：“这些作家乐观执迷于国府的反攻大陆，使作品流于滥情。”^①不过，越来越多的作品，因空间的转移（从大陆到台湾）和时间的错失（年复一年的期待），而使“乡愁”成为集体记忆的郁结。洛夫的诗撼动人心：“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

① 白先勇：《流荡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